

马峰：印度尼西亚华文小说的柔性叙事 1

原创 马峰 华中师大
印尼研究中心

2020年8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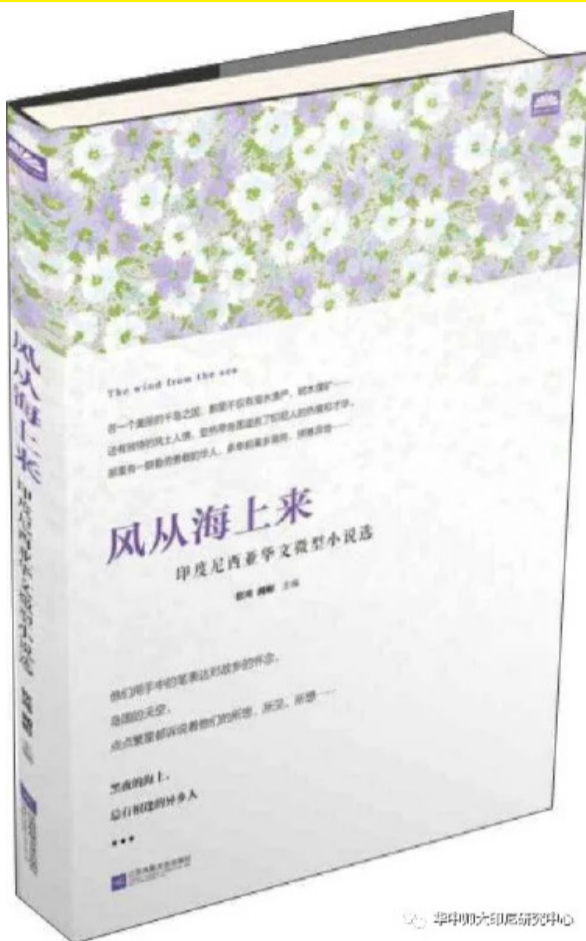
【摘要】印度尼西亚政府封锁华文长达三十二年，导致当地华文文学停滞不前。全面检视华文断层期以来的文学史，可以梳理出一条以爱情书写为主脉的柔性叙事谱系。在文化威权模式下，印尼华文作家执念于爱情题材，不单是为了规避敏感议题，还有潜在的文化坚守乃至文化抵抗的功能。不论是女性的温情抚慰，还是男性的古典兴寄，回望故国抑或呈现本土，在柔性叙事的多维策略内里，都有疗愈族群创伤与建构华族堡垒的隐在文化投射。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爱情小说；本土书写；柔性叙事

【作者简介】马峰，男，山东临沂人，中山大学（珠海）博士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

——原文载于《临沂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在印度尼西亚华文封锁期（1966—1998年），华文文学几乎没有存续与发展的空间。当时全国性唯一的印尼文、华文各半的《印度尼西亚日报》开始出版，该报在政府情报部门管控下设立，曾设有《青春园地》《文艺园地》等文艺副刊。犁青指出该报的设立因由，即“当局为了照顾国内尚有为数众多阅读印尼文书报的华人的需要”



华中师大印尼研究中心

。由于受到官方情报部门的监督，其刊载内容必然受到相应的检查、审核及限制。在福柯看来，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由此而论，只要华人在受官方检查的报纸上进行书写，那么无疑就会成为被征服的客体，其“规训书写”必然成为规训机制获取情报的途径。在有形（新闻条例）与无形（情报监控）的规训压制下，华人就很难实现真正的表达自由。在困难时期，当局的管控，时局的敏感，这些政治考量限制着作品导向，其副刊难免产生逃避政治现实的“风花雪月”倾向。纵然受到种种检查限制，但是印华作家对该报感情颇深，有些作家充分利用了这有限的本土华文空间，即使只能在副刊发表文章也激励

了他们坚持创作，而在政治高压下的柔性书写也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抵抗。

印尼官方施行禁绝华文的少数民族同化政策，为何又要创办一份面向华人的双语报纸？其目的无非有两点：一是宣传官方新闻，二是监控华社动态。对于当权者而言，在体制监管下的报纸是行之有效的统治媒介，而允许报纸发表无关痛痒的华文作品并不会构成实质威胁。在本土狭仄的华文发表空间，仅仅出于避重就轻的安全原则，个体化与情感化的“向内转”书写就发展为一种潮流，而爱情类的“软话题”俨然成为左右当时创作导向的一大要因。此间，有关恋爱与婚姻题材的华族爱情小说大量催生，这种创作风气在华文解禁后也不无影响余续。这些爱情小说的叙事策略大体分为两类，一是直接表现爱情主题，这也为绝大多数作家所采用；二是借爱情主题间接传达族群或文化寓意。

在印华文坛，茜茜丽亚、袁霓、白放情、许也许、何淑慧等都有大量的爱情小说。一般而言，女作家倾向于表现爱情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印华男作家为何也

常钟情于爱情题材呢？这显然不是个别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集体创作潮流。在习惯思维中，女性多与委婉、含蓄、娇羞、温柔、感性等特征相关联，这是女性阴柔的一面，也通常被定义为阴性气质。女权主义者时常讨论甚至批评这些性别差异论，阴性不是女性的专属，男性也有阴性。关于阴性，不是要再次挑起性别战争，而是要唤醒文明教化及未来。阴性气质并无褒贬之分，在印尼的威权文化压制下，身为弱势群体的华文作家无可避免地显出抵抗的乏力，或者说他们带有被规训机制所扭曲的阴性，在创作中也就表现为一种相应的柔性书写策略。当然，不谈文化，不涉他族，无关政治，这与印尼的文化政策有脱不了的干系。不少印华作家的创作题材局限于华族圈子，对外在社会的展现远远不足，而爱情题材无疑是华族自我保护与自我内视的碉楼。抛开作家的创作偏好不论，在这种集体创作背后又有哪些潜在隐情或文化影射？在言情迷雾中，应该不只是发自我体的情感释放，还有来自族群内在的心理宣泄与精神疗愈。

一、女性的温情抚慰策略

女性的爱情小说，多以直觉、感性的形式出现，从语言的婉约到情节的浪漫，都带有直露的阴柔风格。女性有永远话不尽的情事，而言情叙事恰是女性叙事的一大魅力所在。印华

女作家不乏悲情题材，而真挚、纯美的爱情则为女性送来温馨。在华文封闭期间，茜茜丽亚曾长期担任《印度尼西亚日报》的副刊编辑，她在政策权威下尽力保护一些文化工作者避开情报局人员的追捕。她具有作家兼编辑的双重身份，其作品在当时的印尼社会也很受追捧。因此，她的个人创作及编辑方针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印华作家的集体创作路向。无论是最为擅长的诗歌，还是散文与小说，她都以情见长，而含蓄缠绵的风格也臻于纯熟。她早期的《火车，流浪者》《迷途的羔羊》等篇都描绘真纯之情，让真挚的友情式爱恋汨汨流淌。在这些作品中，“流浪”成为主人公感情与生活的常态。借助华族身份，其流浪不羁或无处安身的困境充满族群寓言式的压抑。由于擅长诗歌创作，她的小说语言也充满诗意唯美，还不时将自己的诗作楔入其间。

《榕树下的风铃》直接以短诗开篇，营造出浪漫与凄美的情调，一对有缘无分的爱恋注定了别离的伤痛。徘徊于友情与爱情之间，若即若离的浪漫之中又暧昧四溢，然而他们却始终把持急流勇退或洁身自好的情感尺度。此外，在迷离爱恋题材中，女性往往扮演传统夫权的受害者角色。这些女性大都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而“我”的情感自剖更具当事人的震撼性，她们也在婚恋的伤楚中葆有一份自立与自爱。由于爱情创伤导致信任感与安全感的受